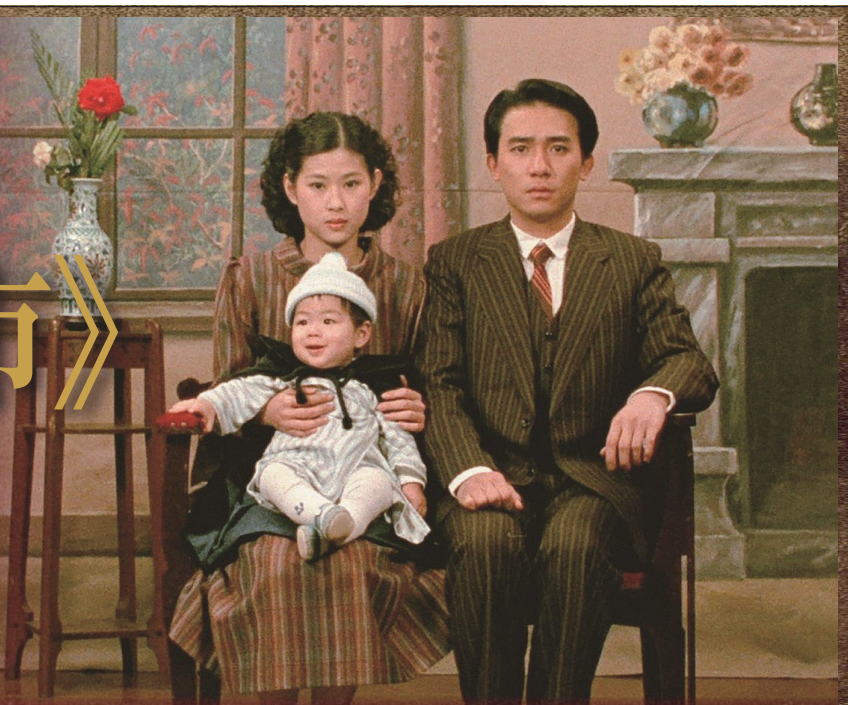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悲情城市》

大銀幕

□ 文 | 本刊記者 郭旭宏



《悲情城市》是一部於一九八九年上映，由侯孝賢執導的台灣歷史電影，並獲得第四十六屆意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獎。

該電影是第一部涉及到台灣政治最敏感的「二二八事件」爭議的電影，講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末，一個台灣家庭捲入從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施加的「白色恐怖」事件，挑戰當時尚未台灣民主化的政府禁忌話題，引發起各界人士矚目。它在台灣影史的地位相當重要，更被譽為「台灣人一定要看」的電影。今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台灣重新上映該片之4K數碼版，四月二十七日亦在香港重新上映。

《悲情城市》延續了侯孝賢導演一貫的長鏡頭電影美學，事件的發生、時間的流淌、情感的變化，皆在畫面中被觀眾感知。影片一開始，便是停電的夜裏，廣播中，日本裕仁天皇正宣讀「終戰詔書」，表示日本全面投降。屋內，女人生產時痛苦的呻吟聲不時傳出，文雄於堂中拜佛上香，保佑順利生產。宣讀完畢，一聲啼哭，響徹基隆田寮港。文雄為兒子取名「光明」，但光明，真的隨着二戰的結束到來了嗎？為全片林氏家族的故事展開埋下了伏筆。政權的變更、時代的更替，似乎對於偏安一隅的百姓人家來說，充滿着茫然無措。一個鏡頭是，酒館內，眾人喝酒時聊起時局變遷，往日懸掛的日本國旗是白底紅日，上下顛倒都是對的；但到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，太陽是在上方還

是下方，沒人能說清楚，側面折射出人們對於新時代到來的徬徨與被動。而片中的知識分子，同為文清好友的吳寬榮，常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喝酒，聊到對未來的擔憂，談論起台灣光復後國民黨的為政不廉、民不聊生時，大家不禁唱起「流亡三部曲」之一的《松花江上》……

除了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浮沉，影片中不同語言的混雜（台語或閩南語、國語或普通話、日語、粵語、上海話），也真實地呈現出當年台灣的眾生相。日據時期留下的日文及文化成為台灣當時民眾生活的日常，無論是隨處可見的榻榻米、飲茶或和服，還是人們台語交談中習慣性夾雜的日語。後來國民黨執政時期，國語逐漸成為官方語言，而民眾生意交談時用到的台語、粵語、上海話混合在一起，通過翻譯來達到溝通的目的。但實則是，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並未達到真正的理解，而是在為權為利的爭鬥中，培養起仇恨與貪婪，又在強權之間尋找活路，不同族群派系的人們自然形成了暴力的角鬥場。片中最值得考究的設定便是由香港演員梁朝偉扮演的林文清，因為聾啞的生理障礙，不得不與他人通過表情動作和寫下文字來溝通。亦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被壓迫的人們的啞口無言、無奈與沉默，去體會當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殘酷暴政和麻木不仁，以及當年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所犯下的罪行。片中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是，火車上，一班身穿制服的軍人挨個搜查，看到